

乡村记忆

# 挣工分的年代

陈志刚

昨夜我又梦回故乡，醒来感叹岁月蹉跎。故乡的父老乡亲、山山水水、一草一木，如同怀旧的老电影，一幕幕在脑海中上演。

在我的记忆中，西由镇不仅很大、很美，而且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它有一条十里长街，横跨东西，像一条璀璨夺目的项链，串联起了龙泉、东北、西北、东南、新合、孙家、天王庙、街西头八颗珍珠。我的故乡街西头村就在这条大街的最西头，如果把西由街比作是一条龙，街西头村就是翘起的龙尾。

我生于斯长于斯，直到1997年7月去县城之前，一直生活工作在西由这块古老多情、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土地上。

从1958年起，到1984年撤销生产队止，有一个词可谓家喻户晓，人人喜欢，那就是工分。每个工分里面，都包含着老乡们的真情和血汗。工分制，是那段时期农村最主要、甚至是唯一的分配方式，也是乡下人最重要的经济来源。

一个社员，根据身体、年龄、性别等情况，经综合考评，可以评定为十成劳力、九成劳力、八成劳力等。十成劳力上工一天，并不能轻松地拿到十分，晚上还要到队部记工并进行评议，根据其一天的表现，再确定能拿多少分。在农忙季节，还实行小段“包工”制，体现出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社员们挣工分的过程，就是努力奋斗的过程，工分是社员的“命根”。

我们生产队刚成立的时候，每个工分的价值折合人民币五六分钱，一个十成劳力表现好了，干一天活儿能拿到五六毛钱，买一盒“大前门”香烟还略有剩余。后来，队长发动大家出主意、想办法，在整治好的沙滩上种上花生，在培土加固的沟崖上，种一些豆类植物，使每个工分的分

值达到了八九分钱。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工分的分值达到了一角二三分钱。

在按工分制分配的制度下，我与挣工分有了不解之缘。

农村的孩子早当家，别看我年纪小，已经能干很多活儿了，比如轧场院，就是用碌碡把一块场地压平整，用来存放收下来的小麦。一般情况下，这活儿都是用毛驴干，用“蒙眼”蒙上它的眼睛，让它拉着碌碡满场转圈，但它有时随地“大小便”，队长便把这活交给了我们这些孩子和妇女。我拉着碌碡，转上两三个钟头，队长便会给我记上两个工分，心里美滋滋的。

再比如，用小推车往每家每户送麦根子，这是队里分给大家的烧草，大人们都在地里忙，为了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便把这个活交给了我们这些大孩子。还有一个活儿，非我莫属，就是从脱粒机底下扒拉麦糠。这活儿不大，但是特别脏、特别呛，扒拉一次，浑身上下全是灰，像个“泥人”，大人们不适合干，有些小伙伴躲着走，我却抢着干，多次受到队长的表扬。

这样整个麦收阶段，我差不多每天都能挣到六个工分。等到了秋收的时候，妹妹也有了用武之地，我们会在姥姥的带领下，到场院去扒玉米。每晚能扒三十多提溜，挣十多个工分。宁静的夜晚，明月高照，秋虫唧唧，我和妹妹跟着姥姥走在村里的小巷上，那种感觉，如今想起来还是百感交集。

等初中放暑假，我回到生产队时，已经是一个像模像样的整劳力了。麦收时，生产队的一个成年男劳力，用镰刀割完一大系子（一亩多）的小麦，再捆好，可以挣十五个工分，是平时的三倍。

记得在三河崖地块，我和社员们刚吃过午饭就上工了。麦熟一响，虎口夺粮。

太阳当头，骄阳似火，麦地就像个大蒸笼，热得让人透不过气来。割到离地头还不到一百米时，我大汗淋漓，头也有些发晕。这时田埂内的一块小土颗粒，突然间把右手紧握的镰刀向上垫了一下，锋利的刀刃一下子割到了左手的食指，直进骨头，鲜血直流。我顾不得疼痛，赶紧从小沟的沟崖边上，拔了一棵七七菜，用手掐碎缚在手指，消毒止血后，牙一咬，脚一跺，继续奋战，猛追割在前面的社员。

“三秋”生产是一场硬仗，在养鱼池那个地块刨玉米时，老乡们叫杀玉米，是“三秋”大会战的第一场硬仗。我和社员们天不亮就赶到了工地。早饭队长安排专人挨家挨户收集，然后用小车送到工地吃。

我头一个上阵，从玉米地的东边刨起了六行，老乡们也叫六角。这时，14岁的妹妹放秋假，也来帮我打下手，专门负责掰玉米。不一会儿工夫，露水和汗水就把我的衣服湿透了，胶鞋里也全灌满了泥土。我就像冲锋的战士一样，右手紧握小镰，把一棵一棵玉米秸连根刨出，再把玉米秸根上的泥土用小镰头拍打干净，然后侧弯着身体，左手娴熟地把玉米秸摆成整齐的一行。虽然手上磨出了好多血泡，累得腰也直不起来，但想到把这一小段包工完成，不仅能挣三十个工分，还能为加快“三秋”进度出点力，心里就有了成就感，干劲自然倍增。

到1980年前后，农业生产逐步实现机械化，效率越来越高，工分也更加值钱，效益最好的生产队，工分价值达到一元多，劳动日值十元多。乡亲们盖上了新瓦房，买上了自行车、缝纫机、手表（三大件）、收音机（一小件），圆了他们的勤劳致富梦，乐得合不拢嘴。

1984年撤销生产队，作为农村分配制度象征的工分，也随之退出了历史舞台。

胶东风物

## 神奇的祠堂

于建章

牟平区水道镇东直格庄李氏祠堂，是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时登记在册的一座保存较好且历史悠久的祠堂。这座祠堂与众不同之处，是外墙上的神龛和台阶上的五子棋盘，在胶东祠堂中极为罕见。

祠堂在村的东南头，坐北朝南，具体建筑年代不详，据村里老人说，大约建于清代中后期，距今200余年。祠堂由大殿、东耳房、西院墙构成四合院，占地面积百余平方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祠堂曾被村里当作仓库使用，即使在“文革”期间，这座祠堂也没有受到破坏。今天在现场可以看到，祠堂原汁原味，没有进行修修补补，最多是松动了的建筑构件又加固了一下。极为珍贵的是，大门上方的“宗祠”二字和两扇大门的门对“陇西望族，山左佑宗”字，据雕刻专家说，这些是凸体浅浮雕，而且笔法端庄大气，字是用兑金铜粉涂刷上去的，虽然历经200余年，现在不是金光闪闪，但是字迹仍然清晰。从字义来看，李姓家族是来自四川西部的大家族。

更令人惊奇的是，在大门东墙的东头有一个长宽各八厘米米深三十厘米的上香用的神龛。牟平博物馆前副馆长张凌波先生说，这在祠堂中极为罕见，一般的祠堂，都是在院子里设香炉，供族人祭拜时使用，在墙上设神龛的一般都是大户人家。祠堂还有一个奇葩之处，在进门台阶最上面的一层，有一副刻在石头上方的五子棋盘。据老人说，这副棋盘是民国初年才刻上去的。当时的一位族长下五子棋非常厉害，周围没有对手，为了与高手博弈，就在祠堂的大门口刻上了五子棋盘，相当于在这里设立了擂台，挑战各方高手。据传，民国年间，这位族长被四川老家来的一位年轻人战败，从此，他不再下五子棋，也不看别人下五子棋。

自20世纪90年代，李氏族人又在祠堂里挂起了族谱和李氏家训，每年的年三十、清明节、中元节族人都来祭拜祖先，祈求先人保佑李氏家族顺风顺水；如遇到族人有大事商议，也都由各支派出代表来祠堂议事，最后由德高望重的前辈拍板决定。

# “大包干”抓阄第一人

李启胜

1981年冬天，对于我们这个百十户的山村来说，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日子。那天，“大包干”的序幕就此拉开。

那是一个清晨，天雾蒙蒙的，远处大青山半截上身隐藏在晨雾中，炊烟中夹杂着此起彼伏的公鸡打鸣声，让山村早早醒来。以往冬日农闲时，山村太阳升得都晒屁股了，村子里还不见有人走动的身影。今天，村里大队部那个大礼堂里人头攒动，空气中夹杂着老早烟的味道。在我的记忆里，那是我们村老老少少全员上阵最多一次，就连身体高位截瘫的残疾人都被家人抬到会场上。人虽然多，但会场很安静。

在会议台的中间放着红纸糊的箱子，墙上挂着“农村走‘大包干’道路，家家户户开启致富路”鲜明的宣传标语。

主席台上坐着村里的干部，大队书记对着话筒“噗噗”吹了几口气，用手敲敲话筒，然后用嘴对着话筒“喂喂”喊了两声，大喇叭里飘出的声音在大礼堂传出

“嗡嗡”的回音。开会了，大家保持安静！听到这个声音，会场顿时变得鸦雀无声，目光都集中在主席台上。

那时候我刚上小学，碰上星期日也去看，开始大队书记在台上说了一些“大包干”分田到户早致富，“大锅饭”养懒汉等话语。我光顾着看热闹，后面话也没听清楚。直到台上叫了好几遍母亲的名字，在一旁和别人窃窃私语的母亲，在别人提醒下才知道叫她。

抓阄要开始了。大队书记说为图个生生不息的好彩头，先找个小孩子抓第一把阄。我站在前面，加上我胖乎乎的，虎头虎脑招人喜欢，大队书记站在台上一眼望见我，就点名道姓地让母亲领我去抓村子里第一把阄。母亲听后激动地领着我走上主席台，我看见她鼻尖上都冒出汗水，我倒是一点也不紧张。在现场工作人员指引下，在众目睽睽的注视下，我来到那个大红箱子前，把手伸进去摸出一个皱皱巴巴的纸团，交到大队

书记手里。大队书记打开我抓的阄，喊着母亲的名字，说分到的田地是长林沟平原上第八块地。

我看见母亲咧着嘴满脸高兴，大队书记带头鼓掌，下面也响起阵阵鼓掌声。我和母亲走下主席台，好多人见了我俩羡慕地说：“孩子手气真好！抓了一块大肥地。”

事后我才知道，那块田地就在香水河附近，土质肥沃、水源充足，是种啥长啥的风水宝地。随后我看见村子里抓阄的人陆陆续续都上台了，按照每个家庭出一个人。没想到在全村“大包干”这么重要的事件，我无意中成了第一个抓阄的人。

那一年我们家分的土地种的麦子、玉米、花生、豆子还有地瓜都是大丰收，屋里屋外都存放粮食。以往舍不得吃的白面馒头，也就是从那一年开始，顿顿吃白面，真正过上好日子。嘿！就连猪圈里养的猪，因为有粮食当饲料，也长得膘肥体壮。